

日本人避孕方法偏好的研究

周云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要:日本人在避孕方法使用上有其非常独特的一面,也就是避孕套的高使用率。本文根据实地调查,分析这种方法形成的原因。其结果是人们的习惯、对自然的崇拜、学校的教育、避孕方法信息的导向、医务界的作用,以及用具的质量等因素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偏好。

关键词:计划生育;避孕套;日本

中图分类号: C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1)06-0027-04

谈起计划生育,人们往往会想到现今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控制生育的发展中国家,忽视或忘却发达国家的控制生育或计划生育。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非常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在计划生育方面或者说在避孕方法的使用上有其独特的一面。自1948年通过了使人工流产合法化的优生法,人工流产在日本一直是一个较为主要的补救计划外怀孕的方法。但50年代中后期开始,人们主动避孕的比例在增长。各种避孕方法中,其他一些国家常用的避孕药在日本的使用率极为低下,但避孕套的使用比例却一直很高(见表1)。1996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已婚者的避孕套使用率为77%。在未婚者中,避孕套的使用率高达96%,可以说避孕套是日本未婚青年使用的几乎是唯一的方法^[1]。为什么日本在避孕方法的使用上有如此明显的个性?为什么大多数日本人会使用这种方法?本文试图通过已有的文献和在当地的调查,深入了解已婚人群如何考虑、选择避孕方法,解释这种避孕方法使用上的独特性。本研究的调查

地点为日本东京都的世田谷区。在1999年12月~2000年2月间作者访谈了15位35~45岁的已婚妇女、个别男士和几位专家和官员。以下的研究结果使我们从多方面对形成日本当今独特避孕趋势的原因有更深入的了解。

1. 惯用方法

许多被访者认为,避孕套在日本已有一定的使用历史,是人们不希望怀孕时首先想到的方法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人就开始使用避孕套,战后人们继续沿用这种惯用的方法。其实早在日本未对外开放之前,已知的避孕套至少有两种^[2]。明治维新(1868年)以前橡胶避孕套在日本出现(这大约与荷兰人有关),1872年开始主要从英国和法国进口避孕套,1909年开始自己生产避孕套^[3]。

一些人口学方面的专家指出,这种惯用方法与日本军队有一定的联系。在男子集中的军队中,人们流传或鼓励这种方法。士兵退役后回到日本各地(特别是农村),沿用着这种方法,并将此传播到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使用人群。这里无法探讨

收稿日期: 2001-03-08

作者简介: 周云(1959-),女,山东青岛人,博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日本军队一类男子集中群体的性行为，只能推定在这类群体中，人们的性行为相对活跃。有关的文献更多提到的是为了防止性病而在军队中使用避孕套。例如，1899年的一份关于海军的调查发现，近1/4的军人染有性病^[4]，可以说在当时性病泛滥。在日俄战争期间（1904~1905年），每个21岁以上的军人会定期收到一定数量的避孕套^[5]。避孕套被当作一个预防性病的有效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将其人口政策从“增加人口”调整到“家庭计划”（控制人口的增长），避孕套不仅用来防止性病，更被用来防止怀孕。

当然，这种“惯用方法”说法的背后也说明早期避孕知识相对单一。在人们熟悉、习惯使用避孕套的同时，有关其他方法的信息相对稀少。一对40岁左右被访谈的夫妇认为，使用避孕套是无法在多种方法中选择的结果。40~50年前，人们视避孕问题为禁忌，互相之间并不谈论有关的问题，社会上也无正面的信息传播、普及各类避孕方法及相关的知识。“个人有自我选择避孕方法的自由，但无从得到相应、需要的信息”。人们的避孕方法信息多来自一些杂志和朋友。杂志中有专门的性咨询广角，其中夹杂着一些避孕信息，但主流信息仍是关于避孕套。

2. 家人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

亲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会影响人们的避孕行为。过去人们很少通过亲人得到避孕信息，特别缺乏代际之间的知识交流。现在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一位被访母亲坚决地说，将来她的儿子长大后，她会告诉他避孕套是一种优秀、有效的避孕方法。另一位母亲表示将来她会同女儿一起讨论避孕问题及具体的避孕方法，让她清楚哪种方法对她自身更为合适、理想和有利。如果父母辈已习惯于某种方法，认定这种方法的优越性，当代际之间的信息交流增加，子女辈也会受父母辈的影响，其避孕方法的选择也会带有倾向性（使用避孕套）。

学校的教育，特别是避孕观念的教育使日本人从小对避孕就有一种清楚和积极的态度。据一位被访谈者的回忆，在小学5、6年级时就有生理方面的教育内容。中学和高中的“保健体育课”上老师必定会讲到有关怀孕及避孕的内容。到了大学，一年级的“女子教养生理学”课里（必修课，放在保健体育课内讲授）老师会讲到更多、更深的有关内容。经过多年的教育，年轻人对自身的生理构造、人的产生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从小就形成了避孕概念，尤其是不

希望有孩子的时候。学校的教育内容不仅仅涉及避孕方法，还包括男女之间感情、爱情的教育。“如果爱对方，想着对方，就该使用避孕套”。“这（使用避孕套）不是什么不好意思的事情”。在这种教育内容的影响下，许多年轻女子甚至把有性行为时对方是否使用避孕套，当作对男子是否真心爱自己的一种“考验”。

3. 医务界的作用

已有避孕概念的青年男女，随着年龄的增加进入婚育年龄，开始生儿育女。在这个年龄段中，人们开始更多地接触医院和大夫，特别是妇产科大夫。这些工作在与怀孕、生育有关的第一线的大夫们强化着人们使用避孕套的信念。据一位被访者的经验，在多种避孕方法中，大夫首先建议的是避孕套，第二位是男性结扎。大夫的理由是这两种方法均为男性方法，对女性身体的负担小。女子若做了结扎手术，再生孩子的可能就小了很多，上环也会给女性带来身体上的不适和痛苦。相对女性方法来说，男性的方法简单，男性结扎手术是没有身体痛苦的。此外，在几乎每家一册的《家庭医学》（不同的版本，例如东京的同人社出版1969年版本）里也解释了各种不同避孕方法。如，人们不太依靠荻野方法是因为高避孕失败率；不服用避孕药是因为必须每天服用，比较麻烦；不使用IUD是因许多女性对这种方法了解不多，对其功效有不确定感。如果采用上环，需要去看医生，之后还要定期去看大夫。结扎手术更为复杂，手术前要通过法律（优生法）的认可。想做结扎手术的人也不一定如愿以偿。关于避孕套，书中提到在产后3个月内为防止感染，避孕套是最为合适的避孕方法。书中虽然是在分析各种方法是否流行的原因，但考虑到这种书进入家庭的途径^①，不能不说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的避孕行为。此外，日本全民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都十分高，这类书籍会被家人阅读，其内容不仅对全家的健康有所指导，对夫妻的避孕行为也会有一定影响。

基层医务工作者在早年也推动了避孕套的普及。在居住地，常有称做“卫生指导员”的妇女上门宣传避孕套的作用，推销避孕套。她们（也包括接生婆和其他家庭计划协会的基层工作人员）是促成人

^① 当一个家庭加入健康保险时，健康保险公司会送给每个投保家庭这样一本书。

们开始使用避孕套,形成使用习惯的一股力量。

一方面人们尊重、听从医生的劝导,另一方面医院的形象和价格又迫使人们远离其他避孕方法。医院在人们心目中与疾病紧密相连,而疾病又是人人都希望远离的。为避孕去医院多少使人在心理上有一种不快的感觉。此外,医院也让人想到痛苦。许多日本男子害怕医院。“医院是可怕的”。“打针对许多男子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怕疼)。如果被动手术(做男性结扎手术),那将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日本男子是不会选择这种让自己肉体痛苦的方法的^①。

此外,日本医疗费用较高,许多避孕手术的费用不包括在医疗保险之中。如在东京都世田谷区的青木妇产科医院,调查当时个人担负的上环费用是31500日元(大约相当于2200人民币)。已有子女的妇女做人工流产的费用是105000日元(约等于7400元人民币),未婚的女子做人工流产的费用更贵。这些费用仅是一个一般的价格,不包括其他检查费用和在一些特殊的身体状况下做手术的费用,也不包括手术后必须做的定期检查的费用。这个医院干脆不做男女结扎手术。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医院、医生、医疗费用促使许多人转向一举几得的避孕套。

4. 崇尚自然

崇尚自然也是许多日本人选择避孕套的原因之一。被访者对自然避孕的定义是在不改变身体原本情况下防止怀孕。上环意味着在体内搁置异物;结扎改变了身体原本面目;避孕药是在改变或控制体内激素量才达到避孕目的的。每日新闻社人口问题调查会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也有类似的结果^②。这些给女性(也包括男性)的自然身体带来变化的方法难以被许多日本人接受。一些被访者虽然没能深入解释“自然”的含义,但在谈话中多次提到,“这种方法不自然”。自然的方法包括避孕套和荻野定期禁欲法和基础体温法等,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这些被推崇为自然方法的高使用比例^③。虽然日本没有一种特定的宗教在“阻碍”着计划生育或避孕(如基督教或天主教的信仰),但这种信奉自然(包括自然的身体)的观点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避孕方法的选择。

5. 妇女的地位

日本女性在避孕方法选择问题上有很重的份量。一方面日本女性因温柔随和而著名,传统上妻子依附于丈夫。在避孕问题上女性也“听凭丈夫的

(意见)主意”。大男子主义主导着避孕方法的选择^④。但另一方面,日本女性在避孕问题上又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一位女士对此有一概括性的总结。人们对日本女性有一种错误的印象,认为她们百依百顺,从不强调自己的主张。而实际上,日本的女性(妻子,母亲)在家庭中有很大的权力。她们是孩子的教育、家庭运营的主要设计者和监督者,是家中的主心骨。她们有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社会网络。男子(丈夫,父亲)平日难得在家,只是给家里带来收入的主要劳动者。在家中,丈夫或父亲是只会工作、专横跋扈(大约只能在家中)、很少有个人兴趣的人。家中的一切都全权交给妻子管理,“如果家中没有妻子,他们的生活会非常地困难”。总的来说,日本男子在经济层面上地位比较强,而女子在生活和文化层面上地位比较强。由于避孕更是一个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女子似乎比男子有更强的主导权。她们在丈夫上班后,料理好家务,然后外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兴趣活动,社区交流活动,志愿者服务等等)。通过这些活动获得不同的知识(如避孕的知识和信息),互相交流生活方面的经验(包括如何管理好家庭和丈夫)。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她们对各种避孕方法的了解,根据个人的喜好(如价格,可得性,安全性,卫生性等)进行选择。由于社会上各种避孕信息似乎都指向自然的方法,其中更强调避孕套的各种优点,可以说接受了这类信息的许多妇女也一定会在实践中运用这些方法的。上面作出那段概述的女士认为,美国人和中国人认为经济上的不独立会带来人格上的不独立,日本女性很少有这种观念。她们接受了男女生理、身体上不同的现实,强调顺其自然,甘愿婚后留在家中养儿育女,尽一个母亲的养育和教育的责任,同时也担起了潜移默化教育丈夫的重大责任。在许多妻子

^① 谈到疼痛问题,笔者在日本清洗牙齿时惊奇地发现,清洗前牙周附近要被涂上麻药。这也许说明许多日本人怕疼,大夫干脆先把来者的神经麻痺掉,再做医疗处理,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② 根据这个调查,日本人极其反感体内有异物,划伤身体,或使用药物等^[9]。

^③ 荻野方法的高使用比例也许和这种方法的创始人是日本人有关。本国人发明的方法该是基于国人的考虑和需求的。虽然日本人战后或更早开始的“崇洋媚外”是众所周知,在现今的日本处处可以感受到,但在避孕问题上,日本人“本土化”的坚定性又是有目共睹的。

^④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和日本都是男子中心的社会。由于避孕在中国流行的时间比日本短,自普及避孕开始就有偏重女性方法的倾向,在避孕问题上,中国的大男子主义更表现在“我不管,你(女子)采取点什么措施吧”。而日本的大男子主义则表现在“我来管,你别想其他的了(包括对其他方法的了解和使用)”。

表1 日本避孕方法使用的变化

避孕方法	第11回 1971	第13回 1975	第15回 1979	第17回 1984	第19回 1988	第21回 1992	第23回 1996
菟野定期禁欲法	32.9	29.9	23.1	11.8	6.6	9.2	8.1
基础体温法	—	—	—	8.4	9.7	7.3	8.9
性交中断法	5.8	6.7	5.2	4.2	4.9	7.6	9.6
避孕法	72.7	77.8	81.1	80.4	76.8	75.3	77.2
洗净法	1.0	1.3	1.6	0.8	0.6	0.9	0.5
避孕药	1.5	3.0	3.2	2.2	2.2	2.5	1.8
宫内节育具	8.1	8.6	8.3	6.3	5.3	4.9	3.8
男性绝育手术	—	—	1.1	—	1.6	1.2	1.2
女性绝育手术	—	—	2.9	—	5.8	5.0	5.3
其他、无回答	4.3	3.7	2.4	5.4	2.7	2.2	2.6

注：① 表中的回数指日本每日新闻社举行全国家庭计划舆论调查的回数。

② 回答者可做多项选择。

③ 数据引自林谦治^[10]。

的心目中，“丈夫是终生需要接受来自女子教育的人物”。因此在家中妻子是一个很有实权的人物^①。这里难以断定究竟这两种解释中的哪种（社会层面上的大男子主义和家庭层面上的女权主义）主导了一个家庭中避孕方法的选择，但妻子在家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主导社会避孕方法的原因之一。

6. 方法的可得性和质量

避孕套在日本很容易获得。药店、超市里，街头巷尾的自动贩卖机里都能买到。脸皮有些薄、较为传统的人可以通过邮购系统购买（价格也相对便宜），以避免“堂堂”地在大庭广众面前购买时的尴尬（这种尴尬常常是个人多虑引起的）。若在超市购买，商家可以立即为你精美地包装，使人感觉良好。许多年轻人会将一个个避孕套放在每天都要使用的月票夹中，方便携带，方便使用。一些被访者认为，日本产的避孕套的质量也是使许多日本人放心大胆使用的一个原因。人们不必担心因质量问题引出的避孕失败，同时防止可能存在的讨厌的传染性疾病，如性病、艾滋病等等^②。

就质量问题，日本通产省早在1952年就从小尺寸、张力、老化、防漏等方面给避孕套制造商制定了严格的生产标准。厚生省的药务局负责指导避孕套的生产，厚生省和国立卫生科学研究所负责检测产品质量。各个厂商也有自己的一套严格质量把关措施^③。正是这些高生产标准和严格的质量检查，使

得日本人相信并使用国产的避孕套。

小结：调查的结果说明，避孕套的使用在日本已有一定的历史，形成了一种习惯。人们从小在学校被培养了一种避孕的概念。随着年龄增加，年轻人开始接触实际的方法，各种有关避孕方法的信息（来自传媒、亲友、医生等等）又都倾向于使用避孕套，认为这是最自然、给男女双方带来痛苦最小、最方便的避孕方法。同时，在现今社会上流传着各种性病和目前仍不可医治的艾滋病，使用避孕套更可以起到一举几得的效果。一方面人们认识到这种方法的优点，有使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制造商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商家也通过各种途径向民众提供着质量优秀、可靠、价格可以接受的避孕套。各种因素加在一起，促成了日本在避孕方法使用上的独特现象。在各种因素中，作者认为学校的教育，从小的教育是十分重要和有效的。利用学校和老师的形象（人们重视教育、尊重老师），通过学校的反复教育，培养起人们的避孕意识。此外，从日本（下转第14页）

① Sumiko Iwao 在她的书中谈到^[7]，日本在1336年以前一直是一个母权制社会，这给现代妇女的“高”社会地位打下了基础。在现今日本社会中，男子是受控制的对象。孔子的“三从四德”的内容应该改成男子的“三从”：“年轻时遵从母亲，成人后服从公司，退休后依从妻子”。她从一个被人忽视的角度解释了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也使人们更容易理解男子避孕方法流行的部分原因。

② 但至今在日本仍没有关于多少人是出于防止艾滋病而使用避孕套的研究^[8]。

2. 项目书中应明确管理层面的责、权、利及地方可自行调节的余地,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应明确注明项目的解释由谁来做。否则在项目的关键问题上,往往由于传达误差,造成基层的误解,影响项目的威信。

3. 项目应追踪评估,公正地提供反馈信息。

4. 做好项目的协调准备:形势分析,组织准备、人员准备、物质准备等分阶段进行工作考核,及时调整工作的力度和方法。

5. 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IEC,提高项目的威信,使基层对经费和利益的敏感性降低直到完全“脱敏”。在卫生管理项目中,提高“捆绑”同类项目的能力。

6. 激活基层卫生管理的活力,把激励机制作为动力,使之产生长期推动力和短期爆发力。向卫生管理投资是今后卫生投资的主要方向之一,对解决卫生问题有事半功倍的作用。许多事实证明,农村人口健康问题不是单一的钱少而造成的,可以通过改善卫生管理能力和水平来解决。

[责任编辑 王树新]

(上接第 31 页)

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惯性的力量。当人们习惯于避孕和使用某种避孕方法,这种方法又确实有效,这个社会的计划生育工作就比较容易进行。但这种惯性的培养需要很长的时间,其结果要在许多年后才能起作用。男性参与计划生育、避孕也是避孕套在日本能够流行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在社会上有意识地培养某种概念和习惯(如避孕、使用某种方法),许多国家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参考文献:

- [1] 林谦治. 避孕, 流产有什么变化? 见: 每日新闻社人口问题调查汇编. 面向平等、共存的新世纪(日文). 东京: 每日新闻社人口问题调查会, 1996. 109, 114.
- [2] Himes, Norman E., *Medical History of Contraception*, New York: Gamut Press, 1963. 125.
- [3] Matsumoto, Y. Scott, Akira Koizumi, Tadahiro Nohara, *Condom use in Japan*,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1972 vol. 3(10), 251.
- [4] 太田典礼. 日本节育史: 明治、大正、昭和初年(日文). 东京: 日本家族计划协会, 1969. 225.

- [5] Matsumoto Y. Scott, Akira Koizumi, Tadahiro Nohara, *Condom use in Japan*,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1972 vol. 3 (10).
- [6] 每日新闻社人口问题调查会. 日本的人口革命(日文). 东京: 每日新闻社, 1970. 120.
- [7] Iwao, Sumiko, *The Japanese Women: Traditional Image and Changing Rea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8] 林谦治. 避孕, 流产有什么变化? 见: 每日新闻社人口问题调查汇编. 面向平等、共存的新世纪(日文). 东京: 每日新闻社人口问题调查会, 1996.
- [9] Matsumoto Y. Scott, Akira Koizumi, Tadahiro Nohara, *Condom use in Japan*,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1972 vol. 3(10), 252.
- [10] 林谦治. 避孕, 流产有什么变化? 见: 每日新闻社人口问题调查汇编. 面向平等、共存的新世纪(日文). 东京: 每日新闻社人口问题调查会, 1996. 113.

[责任编辑 王树新]